

第二十輯

新疆文史資料選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新疆人民出版社

707935

目 录

在新疆新兵营的日日夜夜·····	肖显清(1)
三十年代初七角井的战祸兵害·····	那鸿荻(15)
一九三二年吐鲁番事变记 ·····	柴震森遗稿 柴恒森校补(21)
苦水事件·····	刘应麟(32)
一九三三年冬至一九三四年春保卫乌鲁木齐 省城战役的前后情况·····	金国珍(35)
回忆新疆蒙哈学校创建片断·····	赵新亚(45)
盛世才选送留苏学生的前前后后·····	柴恒森(53)
新疆三十年代学生运动的点滴回忆 ·····	哈力克·沙克(59)
呼图壁县的抗战活动点滴·····	刘洪藏(65)
“国父实业考察团”进新的经过·····	卢桂森(68)
我在一九四四年敦煌至若羌的丝路之行·····	卢桂森(93)
“北塔山事件”及其经过·····	韩有文(100)
《战斗》报的始末·····	李文华(105)
库车事件始末·····	李如珩(118)
南山剿匪记·····	袁学凯(122)

杜重远来新和被害经过见闻·····	李明章(138)
追求光明的一生	
——记起义将领张凤仪将军·····	陈希明(141)
程砚秋在新疆·····	张文忠(146)
怀念考古学家黄文弼同志·····	卢桂森(150)
阜康白酒的兴衰·····	何肇兴(156)
乌鲁木齐戏曲发展史略·····	张文忠(166)

在新疆新兵营的日日夜夜

肖 显 清

西路军失败后，三十军仅剩下一千五百人左右。一九三七年三月中旬，在祁连山中部的一个山沟里，我们改为左路支队。后又改为总队部，下属三个支队：一、二支队为战斗部队，三支队是机关和电台。并成立了新的党的领导机构——工委会。工委书记李卓然（原西路军政治部主任），委员有：李特（原西路军参谋长）、李先念（原三十军政委）、程世才（原三十军军长）、李天焕（原三十军政治部主任）、郭天民（原三十军参谋长）、黄超（原红五军政委）等。经工委会研究，决定在祁连山向西打游击。

是年四月二十日左右，我们在安西的白墩子与敌人激战了两天两夜，我们先后冲出敌人的包围，到达了新疆的星星峡。我记得第一晚到达星星峡的仅有十三名同志，到第二天晚上也不过才有三十来个人。就是在我们到达星星峡的第二天晚上，盛世才的星星峡边务处（即新疆与甘肃交界的哨所）主任王孝典，他把边务处办公室让出做我们的支队部，并向我们传达了盛世才的一个电话。大意是：第一，尧乐博斯叛变了，可能要缴你们的枪，要特别注意；第二，你们到了多少人？枪够不够？把我们边务处的两个班（当时该哨所驻有两个班）的枪

给你们用，这由王主任负责；第三，你们有什么具体困难，我们派飞机援救你们。

第三天，我站岗时，发现远处有个小山包似的东西在缓缓地向我们这边移动。我马上报告队长，支队长杨秀坤同志仔细瞧了瞧说：“那是汽车，快准备战斗！”尧乐博斯果真派人来缴我们的枪了。我们三十多人大多是警卫员，带的是驳壳枪，便迅速埋伏起来。待敌人靠近后，枪声四起，敌汽车这时也熄了火，我们乘机冲了上去，将车上的一个副官扯了下来，带到边务处的房子里（也就是我们支队部住的房子），逼着他给尧乐博斯通个电话。这个副官叫通了哈密 的 尧乐博斯，并按我们教的话报告说：“红军有一万多人，每人身上都有长枪、短枪和大刀，后面还不断地有队伍过来，可不得了啊。”打完电话，我们就把这个副官杀了。

我们就用缴获的这辆汽车，举起军旗，带上一名司号员，向东南方向游动吹号，呼叫我们的同志，大造红军的声威。至此，尧乐博斯果真吓的没敢朝我们这里来，而是向青海方向逃跑了。这时，我们的同志聚集来了不少。工委会的几名领导同志听到我们的号音，也带着一些突围出来的同志赶来了。我们在星星峡呆了十多天，任务是四处寻找突围出来的同志。连日来，我们踏遍沙漠丘陵，四处寻找，共集合起五百余人。鉴于这种情况，领导决定调整组织：把原来的一、二支队合并为一个支队，队长为杨秀坤、政委刘庆南，下辖四个大队，原三支队改名为干部大队。这样就组成了一个新的体制：总队部（工委）下辖干部大队、一支队。总队部有一个警卫排。一支队下辖一、二、三、四大队，为战斗部队。一大队队长简作国、政委周纯麟（现为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二大

队队长赵正洪、政委陈德仁；三大队队长郑志章、政委王世仁；四大队队长宋承志、政委胡炳章。总队部的警卫排分三个班，一班是首长警卫班。

五月一日这天，我们从星星峡乘坐汽车，经四天的行驶，到达了迪化（现为乌鲁木齐）东南二十余里的红雁池停住了车。三个小时后，暮色徐徐降临大地，车队趁天黑驶进了市区，在该市西大桥的一个工厂里下车。原来，这是盛世才的一家新落成的纺织厂的女工宿舍，设备、条件在当时是比较好的，竣工后尚未启用，给我们暂作营房。还安排了我们洗澡，许多同志有生以来没见过浴盆，竟出了不少的洋相。后来我们才知道，盛世才当时奉行所谓反帝、亲苏、民平（民族平等）、和平、建设、清廉六个方面的政策，做出了亲苏容共的姿态，因而把我们的生活安排的比较好。我们睡的是木板通铺，每人发了棉被、棉垫、草垫、床单、枕头。第二天早起，我们个个高兴的笑逐颜开，因为我们有生以来，还未曾享受过这种待遇呢。当时，我们在营房里有几条规定：①为了保密，不要外出，只准在驻地活动；②要把我们原来的破烂不堪的衣服洗好上缴，准备送苏联博物馆；③要每个大队成立党支部。关于每个党员的组织关系要做调查，可由原单位首长作证明，也可有三名以上的党员作证明，才能过组织生活。五月二十日左右，又有几条新的指示：①干部、警卫员、传令兵在西路军失败后分散保存的金子、银子、大烟土等财物全部上缴，如有的同志少了，要向组织说清楚，我们红军战士无论如何不要在经济上犯错误（这个通知上午下达，三小时后各人携带的财物全部交到了支队部，下午都送到了总队部）；②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待

命准备去苏联。如果有人问我们是哪里人，到哪里去？就回答说是盛世才的新兵，分到哪里不知道；③每个人都要检查身体，有病的同志要赶快治疗，否则不能去苏联；④要把伙食改善好（当时伙食确实不错，每日有米有面有肉）；⑤很快就要准备干粮和车辆了，大家也要有所准备；⑥要进行一些城市生活、讲卫生等教育。

我们住了两个多月，后因“七七”事变暴发，形势发生变化，上级决定我们这五百余人不去苏联了。当时对大家教育的内容是：党中央发出了全面抗战的号召，我们也必须服从全面抗战的需要。支队长杨秀坤、政委刘庆南从总队部开会回来，向我们传达的内容是：第一，去苏联的计划撤销了；第二，今后的任务是学习文化，时间多长不清楚。

七月下旬，我们从纺织厂的宿舍搬出，迁移到东门外营房里，与盛世才的部队住到了一起（现为五星路）。这时，我们这五百余人才正式对外称“新兵营”。营区的东面是盛世才的教导团，北面是装甲车队。工委和总队部住在路南（也就是装甲车队对面），干部大队住在离总队部西北五百公尺处，一支队部和一、二大队住在总队部东南二百公尺处，三、四大队住在总队部南一百五十公尺处。盛世才派来了一名卫士住在我们的管理科里，并任副官职务。凡对外的事，一律由这个副官出面（这个副官名字忘了，只知他是东北人，当时有廿五、六岁）。他工作很负责任，我们要求吃什么都能想办法办到。他还告诉我们，水井里的水不卫生，只能用而不能吃，专门派了一辆马车天天给我们拉水吃，风雨无阻。九月后天气冷起来了，又给我们每人发了皮大衣、皮鞋、皮帽、长短毛毡靴。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经陈云同志与盛交

涉，每月发给每个战士新疆币一千五百两银票（相当于现在的一元五角）、排长五千两（五元）、大队干部一万两（十元）、支队干部一万五千两（十五元）、总队首长和工委的负责同志更多一些。

八月份，我们正式开课学习文化。先是上基础课（语文、算术）。大多数同志都能坐下来用心学习，也有少数同志坐不下来，说什么“打仗容易学习难”。我们支队长杨秀坤同志打仗确实是个好样的，但在学习文化上与同级干部相比落后了。有个干部开玩笑地对他说：“打仗我们听你的，学习文化你得听我们的了。”由于撤销了去苏联的计划，他对个别人不满，再加上开了这么一个玩笑，他一气之下用手枪自杀。经抢救，两个月后才出院。李特同志的警卫员也是由于学习不好，用驳壳枪自杀的，因中弹七发而没有抢救过来。这说明了当时思想工作薄弱。后来，加强了思想工作，就没有再出问题。

九月的一天，正值我站岗时，陈云同志（当时与我们总队部首长住在一起）非常热情地向我走来，他和蔼亲切地问我：“你们学习有什么困难？你们打仗打惯了，能不能坐下来学习？”我红了脸，低下头说：“能，能坐下来，就是没打仗痛快”。陈云同志听了我的回答笑了，说：“既要能打仗，也要能坐下来学文化，这可是为了将来更好的打仗。”听了这番话，使我增强了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我的心终于安下来了。为了学习好文化，我们晚上用来背功课。后来，陈云同志还亲自对大家讲话，动员我们好好学习，再三讲：“前方的同志在作战，在流血，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和条件，加倍学习才是，这一切都是为了将来好上前线，多打胜仗。你们要下决心学习好文化，没有文化，是不行的。”

一九三八年一月，文化基础课学习圆满结束，开始转入军事技术、业务学习和训练。一支队的一、二大队学习汽车；三、四大队学习炮（后改为特科大队）；警卫排学习装甲车；干部大队变化大，有部分同志回延安，部分同志调入盛世才部任职，余下的分别学习医学（军医、兽医）和无线电。并从我们这五百来人中选出二十五名同志去学习飞机。这时，部队又有些思想波动。特别是十二月二十四、二十七日陈云同志和工委的几个负责同志回延安，工委和总队部取消，改名为支队部；加之部分大队干部调入盛部任职，因此，一部分人想马上去前线的念头又浮动起来。后因进入复杂的新式装备的学习，加之思想工作的开展，大家很快又安下心来学习技术了。当时，我们全排在盛世才的装甲车队中学习，每天回新兵营吃饭，每星期六过组织生活。为了保密，我们相互之间不称名字而称代号，教官对我们这种做法很反感，因为相互间不知多少号，叫人却没法叫。第二天，我们就去掉代号，每个人起了个假名字。

一九三八年初，从延安来了几十名青年学生到我们新兵营。其中有六名女同志和天宝等三名男同志任我们的文化教员，帮助、辅导我们学习文化，其余的十九人都去学飞机去了。去航空队的同志吸取了我们的经验教训，都改用假名字，就没出什么问题。

陈云同志走后，党中央又派邓发同志来新疆作领导工作。为了鼓舞我们新兵营的学习，他还叫人为我们写了一首歌，歌词大意是：你们为着老百姓，为着千百万的妇女儿童，你们打了无数的仗，学习在遥远的边疆。自从鬼子占了我们的东北，又进攻了我们的长江，看他们杀，看他们抢，飞机不断

扔炸弹，大炮隆隆响。同志们啊！学习文化，掌握现代军事技术，到前线去英勇杀敌！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为着收复我们可爱的家乡……。这支歌说明了我们过去的功劳，又指明了今后的任务，大家唱的非常有劲，鼓起了我们的学习热情。

一九三八年八月，毛主席发电报给新兵营，要求我们好好学习，赶快学好出来，早日上前线，这对我们又是极大的鼓舞。

我当时在警卫排，是学习装甲车的。邓发同志到达新疆不久，动员我们学好技术，并开展了对张国焘的批判。后来，说前线需要枪，又令我们警卫排把短枪全部上缴（有的同志想不通，还把枪破坏了几支）。不久，我们警卫排编入了一支队的三大队，后又编为一大队的四排。警卫工作则由一大队轮流（后来，一、二、三大队合成一个大队，学炮的为特科大队，不站岗）。因而，我们警卫排的同志也就学到了装甲车、汽车、火炮的技术及机枪技术，我们学的课程最多。

我重点学的是装甲车和汽车，从发动机构造到战术技术都学了。光装甲车就学了三种，特别是叫“发依坎”（音）的轻型装甲侦察车，乘员三人，机枪一挺，非常灵活轻便。

“步瓦”（音）二五式、二六式战车，乘员四人，机枪和炮各一，都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教我们的教官是盛世才的军官。教无线电、医学的教官大多数是从莫斯科留学回来的我东北抗联的同志。他们大多出身学生，多数是东北人，也有个别朝鲜人。后来又教我们学习日语、俄语。我们学习了半年的日语，相互间都能用日语说些生活用语和军事术语了。

陈潭秋同志主持新疆党的工作后，大部分时间就住在我们新兵营的支队部。一九三九年七月的一天，陈潭秋同志到我

们宿舍来看望我们，询问学习怎么样？晚上站岗冷不冷？伙食好不好等等。还告诉我们：学习上不要死记硬背，要记要点，把大意、大概意思串起来，就有了全貌，这样才能记住和理解。他还形象地说，要象想点子打胜仗那样想办法把学习搞好，要互相交流学习方法和体会。他经常和我们谈心，每次都查看我们的生活，再三指示要办好伙食。七月至九月，我们进行野营训练，他还和支队领导同志一起察看地形，和大家一起步行。大家都共同地感到，他象老妈妈带孩子一样，把党的温暖传给了我们每个人。

一九三九年九月，我们学装甲车的同志，以“参观”的名义，参加了盛世才的联合兵种演习。与盛部装甲车队在一起（其它学炮、学飞行的参加与否不详），演习了三天。苏联顾问不断地提出情况，要我们判断和行动。演习结束后，我们回新兵营讨论体会时，大家都说大开眼界，学到了不少东西。见到了飞机、重炮、装甲车、骑兵，以及用无线电进行通讯联系，真是开了“洋荤”。有的说：“我们西路军要是有这样的武器，在河西走廊就不会失败，一定能战胜敌人，就不会有成千上万的同志牺牲在西北的黄土高原上。”大家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地学习现代军事技术，将来到抗日前线狠狠地打击敌人。

一九三九年九月，周恩来副主席去苏联路径迪化时，也来到我们新兵营看望我们。他说：“你们是我军较早的、走在最前面的军事技术学校。是种子，是骨干，学不好可不行。”周副主席还来到了我们的宿舍里查看内务，并对我们说：“你们的学习条件、生活条件很好，要抓紧时间学好，多学习一点。我军还从来没有这样好的条件，要争取时间多学习，党

中央一声命令，你们就要上前线去。”我们一听到“上前线”三个字，把目光一齐投向周副主席，兴奋的心情怦怦直跳，真想马上问清什么时候，是马上？还是很远？可又觉得实在问不出口。中央首长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学习热情和信心。

至一九三九年底考核时，我们驾驶、修理、战术射击等项课目，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苏联顾问对我们的学习很满意。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我能对缴获的敌汽车、坦克、装甲车开的动、打的响，就是在新兵营学得的技术。

我们新兵营十分注意同盛世才部队的关系，没吵过架，没出现过引人注目的纠葛。我们见到他们的人，只要是挂武装带的（军官），不管大小都主动给他们敬礼，这使他们很受感动。我们和驻地的老百姓关系也很好，群众说：你们这些新兵真好，说话和气得，客客气气的。哪些老兵（指盛部教导团），天一黑就和妇女拉拉扯扯，还是你们这些新兵“亚克西”（好的意思），从来不和妇女拉拉扯扯。我们的妇女有时和你们新兵讲一句话，你们的脸都红了。我们老百姓都说你们新兵“亚克西”。的确，我们在两年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一个红军战士犯过群众纪律。

新兵营在迪化两年八个月中，学习的课程有十余种：汽车、炮学、装甲、飞机、无线电、医学、政治、文化、算术、外语等课目。虽然每个人不是全部学，但基础课和专业课已是学得不少了。对于我们这些文化低，有的甚至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人来说，困难是很大的。我们之所以能够较好的完成学习任务，由文盲变成能读、能写、能讲、能使用机械化装备的战士，是与党中央在新疆成立新兵营的英明决策，和党中央代

表在新疆的正确领导分不开的。新疆督办盛世才出于他个人的目的，为了取得苏联和我党对他的援助和支持，在表面上对新兵营也很关心，他还几次来到了我们新兵营。

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七年的八、九月间，他派出一个骑兵连先到我们的驻地警卫，随后是七、八辆小汽车。他看望了我们的领导和其他同志。第二次是在一九三八年的“七一”。第三次是在一九三九年的“八一”，我们新兵营开晚会，他是坐小汽车来的，并带着他的太太参加了“八一”晚会。那天，他一到场，先赏了我们每人一万两（十元）银票。并在会上讲了几句话，他说：“鄙人参加这个晚会很荣幸，可惜我没有这个资格。我争取不久的时间里，加入这个行列。”当时我们被他的词藻蒙蔽了，还给他鼓了掌。

晚会上，延安来的几个年轻女教员唱歌跳舞，毛泽民同志表演了魔术，盛世才看了夸赞不已，连连叫好。

另外，盛世才每年有两次大的活动，我们新兵营也前去参加。第一次是四月十二日，是他在新疆取得政权的胜利纪念日，第二次是“九·一八”开运动会。我们每次去，他都让我们坐在主席台前面的位置上。

在这期间，曾传说盛世才要把我们新兵营的待遇提高到尉级军官的待遇。我方代表将此报告了中央。毛主席指出：新兵营应把身体、学习搞好，不必在其它方面费精力。当时我们伙食标准很高，每天油肉丰盛，常吃抓饭，青菜、豆腐都有保障。每星期六还要改善伙食，吃打来的野味，这对繁重的训练起到了物质上的保障作用。

但是，盛世才这个狼种猪的本性慢慢暴露出来了。一九三九年冬季，发生了捆绑我派往盛部任职的干部。一九三八年

间，盛同意我部各营团干部到其部队任教官或主管干部。当时他下达的命令中，将我们去的干部说成是“黄埔”某期的毕业生。后来，盛部人员有的不太服管，除我方干部文化低外，听说是蒋介石派了很多特务到了盛世才的部队里。我记得当时被捆绑的同志有周纯麟、曾玉良、赵海风（已故）等。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天气格外的寒冷，我们以往平静的生活局面发生了变化。过去每个月只放2—4场电影，而一进十二月则几乎每二、三天就放一场，说是过年？未免太早，问首长是怎么回事？首长也不讲，好象有什么秘密，从表情上来看很沉重。十二月十日，又让我们把九月刚发的棉衣换成“推呢坎”（音）的新棉衣，又发给我们新棉被、皮鞋、毡靴。饭食也吃的非常好。到了二十日左右，大家的疑问解开了。这天，召开了回延安的动员大会。陈潭秋同志动员说：因为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党中央决定你们回延安；由于前线需要战斗骨干，你们大部分同志将要到抗日前线去！（大家鼓掌）你们来迪化两年零八个月，在党中央的指示下，在陈云、邓发同志的领导下，你们完成了学习任务，成绩优良，我已向党中央作了报告，苏联顾问对你们的学习也很满意；我来的晚一些，对同志们帮助不够，请多多批评。当时，我们听了他的讲话，很是感动。接着，他又讲了几条规定：①为了保密，你们在学习中的笔记一律不准个人带走，大家包好，由我们负责转送延安；②你们的行李每人不能超过三十公斤，多的东西交到我们办事处；③关于你们的安全问题，中央已做了许多工作。你们的这次行动，延安、莫斯科方面，迪化、重庆方面都有了协定，这是有保证的，请大家放心。这是一件大事，因为苏联要运一批抗日的物资到重庆，

如有人问你们，就说是护送物资的。这个车队有五十余辆汽车，每辆车上开车的司机是红军战士，一百人左右，每辆车上都有一挺机枪。你们由迪化到兰州是有保证的，我们已经与兰州办事处联系好了。在这一路上若出了问题，你们不要出面，有盛世才派的丁参议带几个人办外交。我们内部派朱光同志（他是东北抗联的，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党员）出面。陈潭秋同志再三讲，最不放心的就是河西走廊这段路，各兵站的勤杂人员中，有西路军的伤员，很可能认出自己的战友，为了这次行动的胜利，你们千万不能去认。你们不是学了日语吗？在生活上讲日语，我想，战友们以后会理解的；④我们再三的研究，请示了党中央，还要留下一部分同志在迪化工作，希望被留下的同志要服从组织决定，服从全局的需要。

陈代表接着抒发了自己的感情，他说：要不是工作需要，我也和大家一起回延安，我们朝夕相处虽时间不长，可同志们的学习、训练和高贵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记得今年九月间，支队首长向我汇报学习情况时，说还有十个同志没有入党，主要原因是学习上差一点，其它方面都是好的。我就讲，他们经过长征，三次过草地，特别是在河西走廊苦战半年，能走到新疆，来到这里，就是很了不起了，是很好的同志了。讲到这里，我们班有个叫张黑皮的同志流下了热泪。陈代表最后说：除了××这个人外（一个表现不好的同志，名字忘了，他爱偷别人的东西），其余同志全是干部，有些合理的问题，都要给予解决。最后祝我们一路平安。一席话讲得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我们回想起在迪化的日日夜夜，为与陈代表分离而难过，为学习而依恋，为能重返前线而无比高兴。

一九四〇年元月一日（或二日），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冉冉升起的太阳显得格外亲昵和温暖，这在新疆是个难得的好天气。然而，此刻我们每个人的心情无比沉重。忽然，在人群中传来上车的命令。我们乘坐的卡车都用毡子搭了棚子，还安了电池照明的小灯泡。陈潭秋同志逐项询问准备情况，为了防配路上有土匪袭击，由我们学装甲车的四十多名同志组成武装护卫排，给我们四挺机枪（名叫“铁克辽瓦”），子弹四千余发，日式三八步枪三十多支。陈代表再三叮咛我们：一定要把这些武器带到延安，送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警卫队里去。

上午十时，陈代表宣布出发前，转达了盛世才的送别话和赏给我们每人五十元钱。盛世才的弟弟作为代表也前来送行。丁参议也和我们见了面。

马达开动，一辆辆棚车穿过迪化，街道两边的群众也不知是什么事情。陈代表和盛世才的弟弟把我们送出三十公里处，便停车和每辆车的同志握手告别，并祝愿大家一路平安。我们激动的潸然泪下，我们望着陈代表，呼喊：“陈代表，延安再见！”可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我们和陈代表的永别。

到达延安后，党中央举行了欢迎、欢送大会。欢迎四方面军的同志归来、欢迎新疆的同志归来、欢迎丁参议到达延安；欢送同志们上前线去、欢送丁参议回新疆。尔后，毛主席又给我们作了一次抗日形势报告，记述了联系群众、开展游击战、运动战等问题。

对于盛世才赏给我们每人的五十元钱，毛主席说：“你们个人别要了，因为延安女大的同志连卫生费都没有。你们

这些钱我们也不要，我看作是你们上前线去的伙食费吧！我们鼓掌同意。

一九四二年十月的一天，师政委谭震林同志忽然把我叫了去，问：“肖连长，你是新疆来的，把盛世才的情况谈谈吧”。我谈了不少好的方面，谭政委说：“盛世才投降蒋介石了，把徐杰同志（即陈潭秋同志）、毛泽民同志都逮捕了。”我这才知道新疆出了问题。一九四二年九月，希特勒打到了莫斯科城下，盛世才撕下了他的伪装和外衣，露出了他的真面目，公开投靠了蒋介石，给蒋介石送去不少的羚羊角，这是新疆极贵重的东西。九月廿八日，盛公开捕杀我共产党人，成了全国人民的敌人，激起了我们新兵营同志的无比愤恨。不久，传来中央指示：凡四方面军到过新疆新兵营受训的同志，不要放在连队，尽量放在机关，改作参谋工作。我也由连长改做参谋工作了。党中央对于我们这些学过机械化装备的同志是何等重视呵！

后来，我们缴获了敌人的许多大炮，上级又叫我去任炮兵连长，使我在新兵营学到的技术又有了新用场。在新兵营的日日夜夜，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鞭策我和同志们一起去狠狠打击敌人。